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九次逐字记录

1994年9月28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埃西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
嗣后:阿夫雷乌先生(副主席).....(乌拉圭)
嗣后:埃西先生(副主席).....(科特迪瓦)
嗣后:本·亚希阿先生(副主席).....(乌拉圭)
嗣后:埃西先生(副主席).....(科特迪瓦)

下午3时40分开会

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捷尔-彼得罗相总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就你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祝贺。我还愿向你的前任,萨米尔·英萨纳利大使表示我的赞赏,并感谢他为完成上届会议各项任务作出的贡献。此外,我愿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感激,他以远见指导了本组织的工作,并为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得到维护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中欧和东欧以及随后不久在前苏联出现的旧秩序的坍塌和新民主社会的出现向世界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许多困难和冲突在此充满巨大变化的时期出现。其中一些困

难是由于迅速和草率地转折而直接带来的副产品,而其他一些则是在数十年的推行不充分的权宜措施之后首次出现的问题。此外,如果说各种改革方案迄今未能产生所有预期效果的话,这也是由于对转折当中的各国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别估计不足。

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全面性因各国而异;但是,改革进程的漫长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涉及价格机制的全面变化、财产概念的变化、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法律、商业和金融机构的变化;此外还涉及为人口最为脆弱的部分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因为改革的高昂代价将使这些人的处境恶化。

亚美尼亚的经济同前苏联所有共和国的经济一样受到苏联的解体和向市场经济的困难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变化的不利影响。其过分依赖于与前苏联各共和国的贸易、邻国阿塞拜疆对交通干线的封锁、土耳其的禁运以及1988年灾难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则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其他外部条件,比如由于格鲁吉亚面临的各种困难所导致的交通中断也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亚美尼亚工业生产力的下降。苏联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低效率和过度的横向联合加剧了封锁的不利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亚美尼亚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重要的结构改革方案,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这开始于亚美尼亚民族运动于1990年掌权后不久所发起的私有化进程。其实,将中央计划型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来源于亚美尼亚民主运动的信仰并且被看作是向民主国家过渡的组成部分。

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将随之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中繁荣并能够促进和支撑经济发展。今天的亚美尼亚是一个有30多个登记的政治党派的国家。它已经宣布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并拥有保证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法律。亚美尼亚已经举行了三次自由选举:议会和总统选举以及关于独立的全民投票。即将进行的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和选举国民议会及共和国总统将确定民主传统的建立。

民主对经济转变进程至关重要,这种转折能够分为三阶段,它多少代表着过渡中的所有国家:即机制的改革、长期投资和技术结构的改变以及参加国际市场。然而,有必要制定出优先顺序并且确认当前最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亚美尼亚处于第一阶段的完成,这包括为经济改革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以使私人经济活动能够在其中进行;这个体系还应确保合同得到执行并且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价格放开和私有化;实行一种国家货币;财政和预算稳定;以及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的80%的工作。

亚美尼亚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早对农田和家畜生产所有制实行私有化。中小行业以及大型企业的私有化也在进行。1993年年底随着卢布区的崩溃,亚美尼亚面临着一场货币危机。苏联旧卢布毫无控制地流入亚美尼亚及此后亚美尼亚未能在其境内控制货币政策迫使政府于1993年11月过早地采用一种国家货币德拉姆。政府正在执行一项以控制和降低通货膨胀率、紧缩预算、控制财政开支及向脆弱的群体提供援助为基础的计划。

在银行部门进行了基本改革,首项改革是打破中央计划的单一银行制度,将此分成两层体制,包括一个中央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

亚美尼亚同所有新兴的民主国家一样,经济转轨没有先例可寻。这需要国际社会持久的承诺与耐心以及大量的援助。当然,如果没有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有利的外部条件,就不能希望中短期调整计划和长期发展战略取得完全成功。

我们认识到没有一种单一转轨模式适合于所有国家,或者更狭义地说,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为确保联合国在转

轨国家的努力取得成功,本组织必须改变对各国援助的参与情况和程序,优先考虑计划而不是项目。这种方法归结起来实际上是确立各项计划的关键目标,以使各国政府与援助组织将重点放在其目标上,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加强常驻协调员制度的作用。

亚美尼亚赞赏秘书长的发展纲领,认为这是“和平纲领”的一项重要和必要的补充。它全面和仔细地考虑了发展的各个方面与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在最近举行的世界发展会议上,人们广泛一致地认为该纲领应得到面向行动的框架和实用建议的支持,以解决各发展领域现存的不平衡。我们期待秘书长进一步阐述发展纲领,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以改革联合国系统与政府间发展协商机构,加强整个联合国,包括布雷顿森林体制与拟议的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的协调。要使这一纲领促成全球发展合作关系的形成,就必须进行这样详尽地加以阐述。

亚美尼亚期待着参加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并为此作出贡献。这次世界首脑会议,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举行,是一个里程碑,并将建筑在联合国一系列全球会议作出承诺的基础之上,包括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此后将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些都是建立国际共识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发展与人权是互相关联和相辅相成的。要实现真正的长期发展,就必须尊重各种个人的权利。去年召开的维也纳人权会议加深了了解,使人们理解人权对于稳定、自由、和平、进步和正义的重要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位置的设立对于更有效地实施人权的各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各会员国必须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现有人权机制的效力并支持高级专员履行其职权。

亚美尼亚认为自决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亚美尼亚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明确和一致的。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没有领土要求。冲突发生在争取自决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和拒绝满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权利的阿塞拜疆政府之间。亚美尼亚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提供了道义、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它不能接受军事解决方案,这只能意味着种族灭绝或驱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居民。

自从两年前我在此发言以来,虽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经历过战争升级和相对平静的时期,但在五年的冲突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停火持续这么久的时期。我今天高兴地告诉大会由俄罗斯联邦调解实现的1994年5月12日停火总的来说得到了维持。但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是,通过冲突双方的立刻和直接接触,5月12日事实上的停火于1994年7月27日得到了确定,冲突双方于1994年8月28日重申致力于停火直到签署一项政治文件。

亚美尼亚祝贺冲突的主要各方致力于维持停火和直接对话。亚美尼亚认为,这是建立信任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朝着巩固停火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表明各方坚决致力于成功结束现有谈判的一种迹象,这反过来将使这一问题可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明斯克会议上得到解决。

显然,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方在这个阶段中显示出了对和平的希望。

我们的新的挑战 and 亚美尼亚的优先事项是巩固停火并建立和平。今天存在着一个结束冲突的历史性机会。但是,和平事业需要有国际社会的积极和一致的支持,以巩固停火。过去五年中不信任的积累影响和缺少支持巩固工作的国际措施,可能会增加当前的不确定性和威胁脆弱的停火。

毫无疑问,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持久和平将基本取决于冲突的主要方面和国际社会有没有能力来发展有创新意义的和得到国际承认的机制,来建立和维护和平。

亚美尼亚的主要关注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安全。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都一再表示,它们准备遵守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只有保证和平进程的不可逆转性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其办法是在阿塞拜疆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部署国际安全部队,直至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充分参与下在欧安会明斯克会议上通过谈判达成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办法。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是与联合国的缔造和平努力直接抵触的。亚美尼亚认为,只有通过无条件地和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条约》的期限,才能保证使该条约达到其目的。令人鼓舞的是,关于全面核禁止条约的谈判在去年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希望不久将商定一项使各方面满意的文本。

我们支持把多边裁军工作与联合国有关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在冲突后建立和平的活动结合起来。

在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公平代表性和席位增加问题上

组内进行的辩论是非常有用的。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以反映世界上的巨大变化和本组织会员国总数的增加。然而,安理会席位的增加不应减少其效率。必须在此指出,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了若干建设性步骤来提高其透明度并改进它与非理事国之间的沟通。安全理事会还应具备更好的能力来对刚刚出现的威胁和争端作出反应,以防止它们升级为武装冲突。随着专门从事经济和社会进步工作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协调有所改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更好地协助安全理事会并就可能因经济和社会情况出现的紧急事态向其提出咨询。因此,亚美尼亚充分支持关于改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可能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理事会的呼吁。

改进联合国的行政管理是另一个优先事项。亚美尼亚欢迎当前为精减本组织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程序以便满足现在向联合国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的主动行动。我们特别支持美国的倡议,并高兴地看到大会设立了内部监督事务厅。

让我回过头来减短地讨论一下我在发言开始时涉及的主题。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变革时期,出现了许多预料之中的和出乎预料的艰难之处。当前这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时期使我们对联合国有新的信念,将其视为把当前世界上过于分散的各国人民的利益综合在一起的最好和最适当的论坛。只有通过和平解决分歧和实现国家之间充分的合作才能建立普遍的和谐。联合国从庄严载入其《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中得到力量,正面临着新的责任和任务,它可以并必须领导大家朝着一个组织的更好和更和谐的世界的方向迈进。

最后,我祝愿大会在本届会议所面临的艰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图季曼总统(克罗地亚)(以克罗地亚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特别荣幸和高兴地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开始时向大会讲话。

我认为我们都同意,任何政治家出席大会都是一种重要的时刻来对其本身的想法以及对国际公众的责任作出道义和政治上的重新考虑。这对于尊敬的创始会员国的代表以及我们这些代表年轻的民主国家的人是同样适用的。这是对影响我们各国的各种问题而且也是对这个世界性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其它问题表示我们的观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机会来以最严肃的态度将《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崇高的理想与在为实现这些理想而达成政治协议方面每天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错综复杂情况作一个比较。

联合国有关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崇高的基本原则,与所有世界宗教和哲学以及各国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是相一致的。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艰苦的就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而谋求达成一项共识,以便使《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理想和各国具体的理想的利益相互协调一致。不幸的是,许多国家,例如我们克罗地亚,正在遭受由于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秩序的瓦解而令一种新的秩序的建立而产生的种种困难,因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而付出最大的人力、物质和政治代价。

在作为克罗地亚国家元首以及克罗地亚人民最高代表向大会讲话的时候,我满意地注意到,尽管存在着各种影响国际社会行动的问题,克罗地亚的国际地位已经获得增强和提高。在自从它独立和获得国际承认之后的仅仅几年期间,克罗地亚已成为正式的平等的国际公民,加强了它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并扩大了它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双边关系网。此外,克罗地亚已成为在东南欧建立新的区域秩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解决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复杂危机目前世界上这一地区最严重的国际危机之中成为超级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公认的重要伙伴。

克罗地亚人民在其整个历史中,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克罗地亚复国期间的痛苦经历已经告诉我们,《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所载的崇高原则,如果有关人民没有决心去获得它;

如果他们不愿主动作出很大的牺牲来实现其生命和自由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决策而成功地使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相互一致,这一原则就不可能自动地获得—更不可能得到保障。

尽管作为最古老的欧洲人民之一的克罗地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多国权利,尽管作出了旨在征服领土的公然的野蛮侵略行为,及种族灭绝般地驱逐人民并毁坏克罗地亚人民在诸如武科瓦尔和杜布罗夫尼克等地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如果克罗地亚人当初不愿意作出生命和物质方面的牺牲,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显示出一种建立国家的坚强意愿而决心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同时表示他们愿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来发展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来替代不可行的失败了的旧制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获得自决、建立国家、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我们大家—特别是这一全球最高权力机构—的责任是采取更加果断和有效步骤,谋求种种办法来打破战争给个人和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的恶性循环。作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最高代表,我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它将有一种适当的机制,能够有效地保卫每个国家或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小的新生的国家的权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最高的全球性组织的这种机制,它能果断地预防或惩治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任何行为。

显然,这也意味着以民主的方式保障实现这些权利和普遍接受的原则,以致不必以最艰难的方式以流血和丧失无辜生命的方式来获得每一种权利,因为这种方式会使人们共同记得隐藏的仇恨、偏见和报复情绪,从而造成新的分裂甚至毁灭性更大的国内和区域性危机。

这适用前南斯拉夫各地区的危机,也适用于在卢旺达、索马里、高加索、中东、南亚、非洲或美洲等地的冲突。正是这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危机已表现出了一种极大的罪恶,这种罪恶的来源是用卑鄙的手段在政治上利用关于共同内疚感或历史不公正以及关于整个世界对付一国人民的阴谋的荒谬的说法,也是来源于强调一国人民起着救世主的作用而为其自己征服的政策进行辩解,从而不但极大地伤害了受到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威胁的人们,也伤害了其本国人民自己,因为他们成为自己的谬论和动机的受害者,而这些谬论和动机国际社会是不能接受的也是对其有害的。

在世界集团分化瓦解以及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解体之后,我

们面临着建设一个新国际秩序的任务。所有过去的经验都表明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了获得成功,我们首先需要一种外交和政治谈判的机制,以建立信任并耐心地克服因客观上不同利益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政治努力显然无效的情况下,联合国必须有一种更加有效的机制,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而达成甚至是强制执行解决办法。但是,基于现实政治和利益与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作法都不应该与本组织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应该铭记,确立和保卫新国际秩序的机制不应该仅仅是服务于超级大国利益的协调,而必须是反映在处理区域性危机中的最高责任同时又旨在增强国际社会中构成人类更大部分的小的或遭受危害的成员的安全和进步。联合国必须有资格在国际秩序中保障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进步和平等方面有平等的条件。

共产主义的垮台以及世界两极分化的消亡增强了对出现一个所有人享有更大的公正和安全的世界的希望。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共产主义集团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垮台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国际秩序中产生了暂时的破坏稳定的作用。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主权国家宣布成立主要还是为新的国际秩序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以堕落成沙文主义—极端主义倾向,甚至堕落成一心要征服的侵略,因此在那些地方的作用总是消极的。但是,这种历史变化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小国人民为争取建立国家——即他们在国际秩序内的政治、文化、经济特征和特性——的努力,已极大地促进了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垮台及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没有这种国内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国际关系的充分民主化是不可能。

新成立的小国的安全已成为当今各地区稳定的关键并且应为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奠定基础。它们的全面安全和平等才能使它们成为具体领域和整个全球秩序范围内文明和职能一体化的平等因素。如果文明一体化无损他们的国家、文化和经济的本身质量,小国人民将积极地接受它。在文明一体化中如此地保护国家个性才能为国际新秩序中的职能多边主义提供良好的基础。否则过去的猜测和偏见将继续成为新冲突、甚至文明间抵触的温床。前南斯拉夫局势清楚地显示出文明间分歧可达到的令人不安的规模,如果危机,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不彻底结束,那里的地方侵略行为有扩大成甚至卷入三个宗教文明集团之间冲突的危险。通过接受与所有邻国甚至那些加害与我们的侵略国关系正常化,克罗地

亚一贯支持政治解决,以便不但在平等的基础上为国际新秩序创造先决条件并且努力地实现各文明在世界这个地区有效的融合。

鉴于目前世界的状况,我们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彻底的组织改革,以提高其处理人类紧迫问题的责任和效率。诸如不平衡发展,人口增长,地球生态平衡,人权和集体权利,全球职能一体化,特别是危机点和军事热点的问题要求更有效地组织最高的国际机构。我们需要一个能在确立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的平等规范和义务方面发挥更有效作用的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有权力代表全球社会在危机或影响我们地球人类和生命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干预”国家内部事务。在联合国内,国际社会应该具有能有效地处理人类目前面临的紧急危机以及发展、环境和技术方面挑战的多边机构。

在这方面,有必要认真地审议大会的作用。它的活动必须可信,但仍然不能充当全球议会的角色而损害各会员国的主权。经验提示我们,需要更明确地对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责任进行分工。

区域冲突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因为它们对国际和平造成威胁,而且也因为它们会造成象发生在卢旺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索马里那里的可怕人类灾难。当然它们也会阻碍区域发展进程并且导致难以弥补的生态毁坏和对整个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破坏。

这种状况首先要求改革安全理事会。

全球新秩序已不能再仅仅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联盟或大国的核俱乐部。它必须反映民主、经济和地区的新现实。这些现实必然导致如系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以及某些所谓第三世界具有代表性国家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加强它们的区域责任。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该避免由于理事国数目增加而使决策更困难和理事会无效率的解决办法。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和可信性,以便解决有关国际安全特别是引起战争爆发冲突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缩小所通过决议的内容与实施这些内容的可能性之间的差距。世界各国,特别是在这个体系中具有更大责任的大国,应以诚意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充分的经济和军事工具,以便安理会的决定得以执行。全球组织建立和平的调解必须从静态地冻结冲突和抑制其扩展演变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及时地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消除已经出现

的后果。

在某些案例中,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便足以制止和解决危机,但有时需要表现出坚定的态度。

国际社会必须发展更系统的机制以惩罚不接受或违反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国家。应更有效地对侵略者进行国际政治或经济孤立,并同时成为这种孤立间接受害者的邻国进行补偿。在没有政治一致意见或意愿去使用更有力手段时,制裁成为更常使用的工具。但是,只有在有组织的压力范围内始终如一地实行这些制裁,它们才可能产生预想的效果。

国际秩序民主化需要更注意保护人权,其中也包括惩罚违反人道主义法律和战争法的行为。克罗地亚支持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成立战争罪法庭。克罗地亚同样支持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处理违反人道主义法律最严重的案例,不论是在卢旺达、索马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或海地。然而国际社会也应制订方式方法,起诉拒绝与法庭合作的侵略国家中的罪犯。

克罗地亚建议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干预要求设立一个常设维持和平的特遣队,包括一系列特定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要求通过协定所提供的特殊军事部队。我们相信它能预先防止许多地区危机的爆发,或有助于迅速制止它们。这种国际部队应该在使用武力方面有更广泛的授权,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并且有力地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决定——涉及从人道主义目标到裁军以及非军事化。应设立维持和平部队,以使其组成国家支队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不是他们本国的具体政策。

区域危机的扩散使联合国面临越来越多的任务,安全理事会以其有限资源无法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这使人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必要把执行决定的任务也分配给区域性组织。这就要求重新界定和加强集体安全体系中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处理每个危机点,应该了解它所有具体特点和现实地评价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中区域体系的可能范围。

我们在有关前南斯拉夫地区以及其它区域危机中谋求的解决办法必须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以便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为使解决办法得到接受,它也意味着在细节而不是在实质问题上的妥协。

克罗地亚为日益成功的中东和平进展而感到非常鼓舞。这种进展体现出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的忍耐和智慧。我们坚信如果能够赢得大国必要的一致支持和决心,同样积极的努力也可能在欧洲东南部和巴尔干半岛实现。

克罗地亚欣见在几十年内部和区域不稳定之后权力和平地移交给南非大多数人民。南非最好地证明了,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的平等是无法代替的。

我们还欣见国际社会介入卢旺达,该国虽然不幸未能避免不堪言状规模的人类灾难,但至少已经阻止了死亡和法律状态的升级。我们继续支持目前的各项努力,以使卢旺达实现稳定并防止冲突再次爆发和扩大。

国际社会为最终制止海地的苦难并在那里建立民主秩序而达成协议也令人感到鼓舞。同样,我们对整个拉丁美洲和中美洲成功的民主化和稳定化进程也表示欢迎。我们一直在认真关注着北美区域职能一体化的发展、欧洲更强大的一体化趋势,——尽管还有分歧、以及欧洲和亚洲区域两个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和解。我们还欢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远东起建设性作用。

在这种全球事态发展范围内,并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以积极竞争与合作,而非相互毁灭为目标的同时,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小国,为保证其独立、安全和进步,认为首先应在西欧文明及其经济和安全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克罗地亚认为其福利和稳定在于取得欧洲各一体化组织正式会员资格。克罗地亚准备负责地在制定新的国际秩序方面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在新欧洲一体化链条中构成一个有力环节。

克罗地亚在其获得独立以来很短时间内,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成熟和负责的成员。它在同传统上一直动荡不安的巴尔干地区相连的欧洲西南部已经成为今后稳定与合作的支柱。克罗地亚在其领土上真诚地接受了国际调解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便制止战争并达成既捍卫其领土完整又保护其边界内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解决。克罗地亚按照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各项国际公约的最高标准,接受了它得到的有关塞尔维亚族立宪地位的善意忠告,并已将它们列入宪法。

克罗地亚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波斯尼亚危机和该国战争所造成人类灾难的最沉重打击。克罗地亚已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几十万难民提供住房或临时住所。甚至在因塞族侵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发生冲突期间,在侵略受害者谋求生存空间时,我们也一直在进行这项努力。我们已经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共同商定建立联邦,并以邦联形式同克罗地亚结盟提出各项建议,这些建议已最终导致签署《华盛顿协定》。我们为穆斯林和

克罗地亚结束毫无意义的战争和重新合作已经竭尽全力,在塞族野蛮侵略后,由于国际社会优柔寡断,克罗地亚人已不得不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剩余生存空间作拼死的斗争。

克罗地亚在受其复杂的种族和历史遗产影响的各种情况下,表现出谋求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地区危机的最高度合作精神,尽管它遇到各种消极情况,但仍相信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将最终取得胜利,各新生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实现正常化。

但是,这种合作的意愿和耐心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四分之一的领土被占领,克罗地亚已被分为两部分,不断受到非法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承受着流离失所人员和被战争耗尽的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因此克罗地亚不能无休止地同意作毫无结果的让步,因为危机的继续威胁着国家的生存及其公民的生命,并阻碍着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我们认为,给予克罗地亚更坚定和更一致的援助,以便使其能够成功地在解决危机方面起建设性作用,也是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

克罗地亚已经是并希望继续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和各新生国家在相互承认基础上彼此合作的桥梁。国际社会在冲突各方某些人中存在敌意所造成的突出情况下优柔寡断和无的放矢的做法有可能把克罗地亚推入新军事的冲突,其规模、深度和后果都可能比前一次更加糟高,国际社会不应使克罗地亚毫无选择,只能被迫自行采取所有必要手段,以便捍卫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其公民——流离失所人员——返回被占地区的权利。

我们一直知道,没有国际社会的协商一致,没有各大国责任分工和商定的办法,就不可能解决危机,特别是这样复杂的危机。因此,我们同以前各项和平努力一样,是第一个对接触小组为找出一项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各项努力表示欢迎的。

如果在不损害克罗地亚利益的情况下谋求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被占克罗地亚地区的问题,克罗地亚准备继续同国际社会进行高度合作并保持伙伴关系。这两个危机——一个在克罗地亚,另一个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都有同样的根源,即塞族侵略。由于这场侵略,并鉴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合作日益强大,应该谋求一项一揽子解决办法。鉴于国际社会实行的制裁已迫使贝尔格莱德接受结束战争的提议并同意孤立反对该提议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因此还应该使贝尔格莱德停止支持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

人,因为他们拒不同意重新合并克罗地亚被占领的各地区,公然反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鉴于其实际后果,1991年的武器禁运就是首先针对塞族侵略的受害者。在接受该禁运时,制定全球政策的人自欺欺人地错误认为该政策可以拯救南斯拉夫,而没有看到铁托后危机的发展是因为塞尔维亚在这个人为的共产主义国家结构中企图在所有非塞尔维亚人头上称霸。我们目前对解除禁运是有条件的克制态度,其动机无非是集中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实现和平解决。克罗地亚不愿违心地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但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实现一种既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制止战争,又使克罗地亚被占地区重新合并的和平解决,那么克罗地亚将被迫同族侵略的其他受害者合作,接受这场战争。

克罗地亚欣见贝尔格莱德宣布愿意孤立作出其自毁战争选择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但克罗地亚希望贝尔格莱德对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叛乱者也这样做。克罗地亚要求也把解除对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制裁同结束对克罗地亚地区的占领,即同其重新并入克罗地亚立宪和立法体制联系起来。另外,我们只能在看到所宣布的孤立是否真正实行后,在它受到有信誉的控制机制核查后,才能解除制裁。

为了促进积极的趋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理解部分象征性暂停制裁,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目前塞尔维亚境内表示致力于和平的人。但尽管如此,克罗地亚将继续坚持要求,把解除对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制裁,特别是与同全面解除国际经济孤立和所有其他孤立有关的制裁,同被占克罗地亚地区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

克罗地亚针对同塞族叛乱者进行对话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但是现在,经过三年的占领,克罗地亚要求国际社会重新确定规定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69(1992)号和第871(1993)号决议的联保部队任务,并迫使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接受按照所通过的和平计划逐渐实现正常化与和平。

我们认识到,在经过任何冲突之后,双方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恢复和加强彼此的信任。我们也相当了解,不保障塞族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就不可能在克罗地亚实现长期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实际上通过三年前实施的特别宪法来保障这些权利,但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为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执行该法创造条件。我们最近也决定加快建立人权法庭,并准备接受国际上对遵守人权和民族权

利情况的监督。但是,塞族叛乱者的领导人及其在贝尔格莱德的主子应当放弃其大塞尔维亚的设想,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整个社区的利益接受在这种基础上被占领的克罗地亚地区的重新合并。我们准备通过开放通讯、居民的返回、重建被毁的村庄和城镇、提供社会福利和法律保护来接受逐步的合并。克罗地亚民主政府准备真正遵守有关塞族社区权利的所有保障,同时敦促解决基本的政治问题:恢复克罗地亚国家对被占地区的主权。

根据其和平政策,克罗地亚也准备使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为此目的,我们将接受任何导致贝尔格莱德承认在其公认国际边界内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会谈,这将使得向塞族叛乱者发出的必须逐步合并的信息相当明确。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在大会提出有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克罗地亚共和国部分地区的占领问题,因为有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正把被占领的克罗地亚地区在军事、司法、海关和货币方面全面并入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法律体系。我们谨感谢大会中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向他表示支持的绝大多数国家。如果贝尔格莱德在此期间表示愿意承认克罗地亚国家,并真正支持重新合并和正常化,我们将很高兴免除大会进一步处理这一问题的任务。

我们也要感谢大会对克罗地亚战后重建的支持,我们期望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继续持谅解态度。

具体地说,我们谨强调,克罗地亚共和国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任何关系——外交、政治或经济——的正常化都不会影响克罗地亚人同穆斯林在实现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联盟及其同克罗地亚的联邦的《华盛顿协定》方面的伙伴关系与合作。

不建立力量的平衡就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实现和平,任何人民的未来都不能存在于无休止的对等军事消耗或是阻碍整个区域的发展之中。因此,我们真正赞同克族和塞族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要执行《华盛顿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不仅是塞族侵略受害者的一个战术性手段,而且也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数量较少的克罗地亚人的完全平等创造了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这保障了未来的区域稳定和力量的均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同克罗地亚共和国之间的联邦关系为维护以历史、地理联系和地缘政治现实为基础的健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提供了基础。克罗地亚同意结成联邦关

系时,也准备在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协助下,承担其责任,限制所有方面正在暗中燃烧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性趋势,这种趋势的扩大不仅会损害欧洲东南部这块地方的稳定,而且也会影响更大地区的稳定。

克罗地亚也重视加强和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及其同克罗地亚的联邦关系,这方面的进展取决于双方关系和国际社会今后几个月的行动,因为这建立了通往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桥梁。我们已经按照这些原则同土耳其、约旦和其他抱有同样愿望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密切合作。

今后几周和几个月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在此期间为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严重危机而斗争。不仅是冲突各方,而且首先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在这一时刻承担着巨大的责任。这不仅涉及有关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任务期限的决定,而且也涉及接触小组是否能够成功地维持一个团结的行动基础,以便实现解决,还是让形势恶化为新的军事恶梦。国际社会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所作的努力目前在扭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所受侵略的后果方面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加强烈地受到了考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能够最终解决这种危机。仇恨必须让位于克罗地亚重建后的武科瓦尔的儿童的幸福笑脸、修复后的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的灿烂辉煌、在长期受难和被摧毁的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的和平共存。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为了整个全球秩序和联合国的利益作出共同努力,以在世界这一地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英明远见,克服灾难性的战争和政治危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金吉贝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不仅是你个人和伟大的贵国的光荣,也是整个

非洲的光荣。作为同尼日利亚有着非常好的兄弟般关系的科特迪瓦的代表,我们完全相信你有能力顺利地履行你的崇高职责。

我要向你的前任、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先生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以令人敬佩和有效的方式主持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事务。

也让我赞扬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以坚定的方式履行他的职责。

我国政府衷心欢迎南非返回大会。几十年来,种族隔离的政策使这一伟大的国家无法参加大会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种族隔离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长期斗争的所有人们致敬。必须向我们的南非兄弟姐妹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是这一罪恶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并且是消除这一制度的斗争中的先锋。

我们赞扬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远见和政治家风度,他领导有效,如此高明地处理一个一度分裂的国家向一个统一、不分种族的民主国家的过渡。我们赞扬曼德拉总统的政府以及全体南非人民的勇气 and 不懈努力,医治过去的创伤,在所有公民人人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使他们的国家走上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道路。我们相信,新南非将为联合国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不仅出现了复杂的挑战,而且为联合国带来了新机会,以便联合国加倍努力,为争取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建设一个以合作为特点的世界和一个共同关心人类的国际社会。

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人们期望因冷战结束而带来的和平世界还没有出现。世界继续面临一些最恶劣的冲突形势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因国家内和国与国之间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宗教上不容异己而产生的暴力冲突的数量剧增。尚未解决的卢旺达局势、利比里亚局势、索马里局势、阿富汗局势、柬埔寨局势、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和前苏联部分地区的局势,已经造成草菅人命和财产破坏,引起巨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必须尽早找到持久办法解决这些冲突,因为它们继续威胁着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

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的中心点,应该力求重新界定它的作用,建立新的结构和机制,有效地应付处理危机和解决冲突的各种挑战。联合国必须保持带头解决这些问

题的首要责任。秘书长的《和平纲领》为此目的提供了一个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架构。

在正在兴起的世界秩序中,非洲决不能继续是一个受危机困扰,依靠其它国家来解决非洲内部冲突的大陆。认识到这一点,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于1993年建立了一个预防、解决和处理冲突的中心机制。然而,非统组织有效地动员为此目的所需的财政和后勤资源的能力显然十分有限。因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通过增加财政与后勤支助的办法,鼓励非洲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区域和其它安排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我们促请国际社会为非洲统一组织建立的非洲和平基金紧急和慷慨解囊。

联合国迅速、有效地响应请联合国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要求的能力,取决于会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联合国应起首要作用,以及它们是否准备贡献必要的资源,使联合国能够履行这样一种作用。自从34年前加入联合国以来,尼日利亚一直积极参加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处理危机的全球性努力。我们多年的经验已使我们相信,显然需要重新审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努力,并重新确定这种努力的方向。自从参加驻利比里亚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观察团这支次区域维持和平部队以来,尼日利亚已经成为非洲,事实上是世界上对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最多的国家。虽然有一两个会员国可能不愿意承认尼日利亚的贡献,但联合国组织所掌握的记录将清楚地表明尼日利亚对全球维持和平的共同责任的重要贡献,以及它因此而作出的牺牲,包括尼日利亚人的生命损失。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各冲突场所维持和平人员不断遭受骚扰、绑架和杀害,感到关注。为了鼓励其它国家参加这些代价昂贵、而且经常是危险的行动,联合国必须发展一种有效的威慑能力,阻止这种攻击,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而充分地赔偿受害者。

冲突扩散令人不安的后果之一是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坚信,各国政府必须创造各种结构和适当的条件,使人们能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充分享受其人权和基本自由。令人遗憾的是,非洲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是世界上最多的。这给接受国家原来已经困难的经济增加了额外和巨大的财政、物资和社会负担。我们赞扬国际社会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解决难民问题的努力。我们请各国政府消除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存在的根源,创造适当条件,

为他们自愿返回各自国家提供便利。

尽管冷战已结束,核武器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仍然必须是大幅度裁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最近关于核材料走私不断增加的趋势的报导是核扩散令人担忧的新发展,必须紧急予以制止。

明年《不扩散条约》的审查和延展会议必须大力进行。该《条约》迄今比较好地满足了国际社会的需要。《条约》的审查和延展必须符合客观现实以及会员国的基本期望。

和平与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提出的“发展纲领”(A/48/935),这是他早先在“和平纲领”(A/47/277)中提出的建议的合适补充。秘书长在“发展纲领”中提出了五项要素:和平是发展的基础;经济是进步的动力;环境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义是社会的支柱;民主是善政。尼日利亚欢迎这些观点,因为我们相信人民必须是一切政府活动的核心,也是发展、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的核心。

多年来处理发展危机的全球努力反映了北方工业化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意见的分歧。我们必须承认,发展与和平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至关重要,北方和南方应把发展方面的合作视为互利和伙伴关系。人们期望,冷战的结束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遗憾的是,这种期望仍未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应采取果断、富有想象力的措施,以弥合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贫困中的富裕既不会带来和平也不会带来安全,对富国、穷国来说都这样。

非洲继续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核心是债务危机。投资减少、资本外逃和商品价格下跌等久拖未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国际社会的反应软弱无力,非常不足。《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纲要看来也不会取得多大成功。因此,必须使非洲能重新开始,通过以富有想象力的办法解决债务危机并使其经济多样化,从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就我们来说,我们承认必须制定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们的政治机构和进程进行根本改革,我们目前正在这方面采取措施,但是,有必要发展新的机构和战略,以建立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机构民主化方面作出努力后,尼日利亚与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面临着某些严峻的现实,其

影响通常被误解,有必要充分理解这些影响。

作为民主化一个方面的政治多元化已根深蒂固地融入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根据我们民族的具体经验、处境和愿望发展适当的民主机构和价值观。我们仍然致力于这一进程,尽管有困难和挑战,该进程已起步。

尼日利亚以及非洲若干其他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经常没有正确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近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缺乏信息传递的资源和能力,使我们不能客观地介绍我们社会中发生的情况。例如,我们尼日利亚继续在重建持久的民主结构和机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制宪会议一直在艰苦努力,以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促进人民间的互相信任、信心和共同目标。与会者主要是选举产生,代表社会中广泛的群体和互不相同的利益。会议的目标是为实行可行的民主秩序建立合适的方式、机构和框架,制订建立政党和在政府各级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准则。制宪会议将于1994年11月前完成其使命。在取得迄今为止的进展后,政治活动已经开始,将导致大选的全面政党活动将于明年初开始。尼日利亚人民和政府致力于实现民主的决心仍然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民主化的任务主要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为了我们人民的利益。

联合国作为协调各国行动必不可少的论坛自创立以来,无疑拥有了出色的表现。我们相信,今后它将继续作为一个论坛,激励我们为实现永久和平与正义进行集体努力,尤其是激励我们为振兴和加强本组织进行集体努力。尼日利亚政府赞同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即要应付新时代的挑战,联合国必须加强其能力,对它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并调整其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赞同他建议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政治承诺和财政资源,使本组织扩大、调整并重振其工作。

本组织迄今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零零星星的,步伐不大,我们已多次表明,现在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根本改革的时机已到,目前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及决策进程不能充分反映因冷战结束而更明朗的现实。联合国是多边合作的工具,必须透明、有效和民主。

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全理事会的结构、组成和决策进程应该体现全球范围谋求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尼日利亚尤其重视安全理事会席位分配和成员数目增

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我们期望,它产生的建议将使联合国能够对国际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作出反应。我们还期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标准应该将这样一些考虑包括进去,例如人口、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能力,以及一段时期内在国际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努力方面的表现。所有常任理事国应该享有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并履行各位成员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同样重要的是公平地域分配的必要性。根据这一原则,非洲在安全理事会中必须有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我应该重申厄立特里亚希望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为国际社会服务。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里,联合国专注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促进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在这两个问题上,联合国对我们的集体愿望作出了反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必须再次致力于充分实现联合国的这些核心目标,以使人类享有和平、自由和繁荣。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迪克·斯普林先生阁下发言。

斯普林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热烈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你是在联合国五十周年前夕联合国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就职的。

对派代表出席大会会议的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过去一年是取得进展和产生巨大希望的一年。在南非,通过选举建立了一个民主和不分种族的社会,为非洲这个饱经磨难大陆的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相互容忍与和解的榜样。在中东,在加沙和杰里科成立巴勒斯坦机构为在该区域全面解决冲突铺平了道路。在人们的记忆中,该区域曾几次带来全球对抗的威胁。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外国军队的撤出标志着本大陆分裂的结束,预示着一个自由与和平的欧洲的来临。在我本国的岛屿,即爱尔兰岛,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完全终止军事行动开辟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前景,这一前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不存在。

多年来,爱尔兰的外长习惯向大会汇报同北爱尔兰冲突有关的事态发展。他们常常谈的是残杀和破坏、政治行动的失败以及在人权方面的争执。北爱尔兰的冲突似乎属于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范畴,不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也不论为它的解决作出了什么尝试。

今年我的发言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我带来的信息是希

望的信息。过去12个月大大加强了爱尔兰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前景。的确,一项解决办法的结构尚待建立,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打下十分牢固的基础。

副主席艾布鲁先生(乌拉圭)主持会议。

北爱尔兰冲突的根源在于对于本世纪早些时候爱尔兰的分治是否剥夺爱尔兰人民自决权这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这一分歧在北爱尔兰两派不停的暴力行动中表现了出来。目前他们在基本宪法问题的分歧仍然深陷于两个极端。这一冲突让北爱尔兰的所有人以及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付出了代价。处理这一冲突是两国政府面临的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之一。经验表明,两国政府这样作的能力将直接同我们之间达成协议的程度成正比。

双方恐怖主义行为的根源在于过去遗留下来的我们立场之间的差距。因此,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议对任何解决办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去年12月,爱尔兰和英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宣言》从而大大巩固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并给冲突所有各方提供了一个结束无休止的流血和报复循环的难以拒绝的政治方案。

在《联合宣言》中,英国政府承认,应该由爱尔兰人民自己在没有外来阻碍的情况下根据两方之间的协议,在南北双方自由和同时给予的应允的基础上行使自决权,并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如果这是他们的愿望的话。爱尔兰政府同意,总的来讲,爱尔兰人民自决权的实现和行使必须得到北爱尔兰多数人的同意和应允。

《宣言》谋求以不带有胁迫色彩的方式处理自决问题。政治上的应允现在被明确确定为爱尔兰任何稳定安排的必要目标和检验标准,无论其构架如何。《宣言》明确指出,英国政府不是爱尔兰民族主义传统的敌人;爱尔兰政府也不是工联主义传统的敌人。《宣言》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确认,爱尔兰今后的安排是在南北双方的爱尔兰人民之间作出决定达成协议,它还正式承诺英国政府的作用将是促进达成这一协议。

因此,《宣言》标志着与过去一些概念的果断脱离。这些概念在爱尔兰历史上产生了如此黑暗的回音,以致于可以把在爱尔兰的安排判断为英国行使对爱尔兰行使的权利。这又给民族主义传统对联合主义派别不可质疑的权利作出新的更加深刻的确认开辟了道路,这些权利来自它在爱尔兰作为一种独特传统的地位。《联合宣言》有很长一个章节

专门谈论这个问题。

在长期的内部辩论后,爱尔兰共和军于8月底决定赞成完全停止军事行动。这项决定已在这期间的其他声明中得到确认。更重要的是,它在实地得到了维持。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态发展。

这首先令人欢迎,因为它拯救生命。其次,它打开全面谈判的前景,这些谈判将以民主原则为指导,在和平的背景下进行,并包括卷入这场冲突的所有各层次。这种谈判成功的潜力最大。而且,谈判的结果可能比一项范围较窄的协定更具有权威性。一项范围较窄的协定必须在暴力和镇压持续的背景下加以实施。

我们还在等待效忠派准军事部队的暴力行动结束。我仍然满怀希望,他们也会认识到,他们的暴力是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其他人所厌恶的,对他们的事业有害无补。我们希望统一派社区中负责的政治领导人能在这一问题上强烈地表示他们的意见,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希望效忠派方面也能完全停止暴力。

我们现在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为爱尔兰各种不同政治传统的人们之间达成持久的协定创造基础。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再受过去的束缚,而是从各方面汲取过去错误的教训。

也许这里最大的错误是双方一度都有的一种不加怀疑的假设,即集中在北爱尔兰狭窄的土地上的这场冲突,只能以一种传统或另一种的传统的胜利或失败而结束。妥协被看成是走向失败的第一步。通过一个代价昂贵的实践和犯错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已懂得,在北爱尔兰局势中,胜利和失败的概念是不现实的。每一个社区都有足够力量挫败对方,但却不能单独取得胜利。因此,普遍的政治协议完全是实际和必需的,也是一种理想。

现在对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的挑战,是抓住和平的势头。我们需要同北爱尔兰的所有政党一起,建设新的架构,反映出我们的经验教训,并遵循《联合声明》的原则。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一种多数“赢者全拿”的制度非常不适合北爱尔兰这样的社会,那里的分离主要是社区性的,而且不变,而不是社会或经济性质,因此会变的。因此,让我们应用这一教训,把协议和协商一致变成所有新的安排的核心内容。

北爱尔兰的特点是,在以北爱尔兰还是整个爱尔兰岛为

合法的参照标准的基本问题上完全缺乏共识。让我们在一项新协议中作出新的安排,即承认和协调这两种说法的效力。

爱尔兰的政治分离约束了可以促进岛上两部分地区福利的各种建设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让我们在北南双方之间建立有效的新的结构,纠正这种状况。

迄今为止,主权的選擇是一个社区或另一个社区胜利或失败的一种简单标志。让我们尽可能把这一概念同一切党派或部落的含义分开,商定无论哪个政府行使主权,定将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或将来,以一丝不苟地平等对待北方两个社区及其权利、特征和效忠对象为条件。

我相信,按照这些方针作出的新的安排将使关于主权问题的冲突减少目前的许多对抗和冲动。在按照这些方针作出的新安排下,有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议的支持和保障,关于主权选择的冲突可能不再成为现在这样的一种造成不稳定的问题。相反,这一问题可根据商定的政治基本规则来处理,对两种愿望都不折不扣地公正和公平,作为相互说服和比较利益的问题。北爱尔兰可以成为一个特别致力于保护两个社区的权力的地方。那样,当地的两个社区就能第一次真正地表现自己,它们或许能在目前只有分歧的许多领域找到共同目标。

爱尔兰政府将在一些不同层次争取朝着持久和解推进。我们正在设立一个和平与和解论坛,让爱尔兰境内所有赞成和平与和解的民主党派能够就在爱尔兰的两个传统之间如何促进和建立协议和信任的方式提出建议。它将不是一个谈判论坛,虽然我们希望它的工作能为谈判气氛作出积极的贡献,它的建议能够变成行动。

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正在拟订一份联合纲领文件,阐明它们自己对问题怎样才能得到平衡调解的看法。我们将向其他各方推荐这项文件,但当然不能把它强加给它们。我们希望这份文件将给全面谈判的进展带来新的推动。

上述事态发展已经为北爱尔兰问题实现全面、公正与和平解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应当尽早谈判并就新的政治结构达成协议,以实现这些事态发展的潜力。如果我们有抓住这一机会的集体勇气和想象力,我们在爱尔兰的各种关系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开端。爱尔兰岛上全体居民对持久和平与政治和解的愿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

如果说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洋溢着希望的信息的话,那么

我们也知道在其他地方旧的怨恨和种族敌意已经抬头,造成恶劣甚至致命的后果。

索马里、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冲突,在海地和东帝汶粗暴践踏人权的状况;数百万被剥夺了享有食物、饮水和住房的基本权利的人们的痛苦: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放松创造一个和平世界和维护人类尊严的斗争。

当今许多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这些危机基本上是国家内,而不是国家间的冲突。

我认为,在联合国创立将近五十周年的时刻,摆在联合国面前的中心问题是:产生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家间冲突,并专门设计来防止和解决这种冲突的联合国,能否充分处理各种内部危机和国内冲突?

我知道有人认为,联合国不应该干预这样的问题,许多国家内的冲突不是外来干涉能解决的。我可以理解这样的论点,以及不想参与其他人民内部争执的谨慎愿望。

但是,我们能让如前南斯拉夫境内局势这样的危机升级发展到有可能带来一场更广泛的巴尔干冲突的程度吗?

我们能够袖手旁观数百万的卢旺达人在卢旺达遭他们的同胞屠杀吗?

我们怎样才能算出内战造成的死亡没有国家间战争中的死亡重要,受本国人威胁的人们不象受邻国威胁的人们那样值得我们的帮助?

我找不出如此区分的道德理由。

卢旺达境内的恐怖与暴力令人发指的升级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可在近年来与人类苦难相连的地名上——萨拉热窝、戈拉日德、摩加迪沙、拜多阿——加上戈马、布卡武和恩加拉。

卢旺达悲剧揪住了爱尔兰人民的心灵。今天,有100多个爱尔兰援助工作者在这一地区。70多名爱尔兰公务员和军事人员现在正在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和各种援助机构工作。

我国总统玛丽·鲁滨逊希望不久访问卢旺达,向这一多难土地的人民表示声援,并强调需要采取国际行动。

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和索马里危机的反应显示出一种愿意帮助的慷慨意愿。许多人类痛苦已被减缓。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近实现持久解决。我们也没有接近建立一种体系,防止类似恐怖在今后发生。

我们要问,联合国如何才能在卢旺达发挥更加积极的调

解作用?

在政治动乱迅速恶化成为国内冲突时,联合国是否能够防止种族灭绝战争的爆发?

在种族灭绝后大规模出逃时,联合国是否能作出更加连贯的反应?

联合国现在怎样才能协助解决这场冲突?

我相信,除非我们使联合国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它们是我们时代最有代表性和急迫的问题——否则,我们组织的信誉和作用将日益受到怀疑。

内乱和内部纷争的根源通常是复杂和深刻的,——比国与国之间战争的起因更为深刻和更加复杂。最近的经历表明,仅仅诉诸于第七章采取行动是不够的,而且外部介入只会增加而不会削减危机,除非这种介入是经过精心筹划和得到谨慎执行的。我们必须接受这方面的教训并且懂得,建设一个能够迎接新时代挑战的联合国将需求在很多领域进行协调行动。

我将提及我认为应当采取优先行动的七点:

我们必须改革安全理事会,以使其更能代表联合国已经大大增加了的会员国并且反映过去50年来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

我们必须发展本组织作出早期预警和调停和及时干涉争端的能力,以使其不至失去控制。

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能力,以使其在危机爆发时更具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我们必须增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运作能力。我们尤其需要一个更加发达的人权监督体系。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

我们必须加强努力,通过执行秘书长的发展纲领铲除许多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平等、社会不公正和贫困。

我们必须以通过一种常规武器转让的行为守则对战争和压迫的工具的国际流通进行限制。

目前,各国对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多地代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并且对其需求更好地作出反应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我认为,就增加安理会会员国总的数目尽早作出决定是有必要的,并且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增加应反映过去50年来国际生活的变化。

我们的辩论已经显示出,作出具体决定并不是容易的事

情,但我们必须避免陷入对最佳数目和各区域大国相互竞争的要求的狭隘考虑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在我们的决定当中作出一种承诺,即在未来某个具体日期再次对安全理事会成员问题进行审议。这样,我们得以为一种目标而努力,该目标反映当前的地理政治现实、承认这些现实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并且认识到所有会员国都具有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潜力。

为改善透明度所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值得欢迎的,但还必须作出更多以促进安全理事会和广大会员国之间的交流。我们能够从《宪章》中删除一些提及已经不复存在的敌人的行为的时候也的确已经到来。

卢旺达和索马里出现的可怕的危机已经表明,我们需要紧迫和更仔细地看待联合国在预防和缓解冲突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我们还需要考虑加强各区域性组织参与解决冲突的能力的方式。我们必须准备充分地利用《宪章》给予大会、秘书长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各种职能。

我们必须确保,迅速使可能导致对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信息受到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注意。我们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具备这种手段的。我们现在应当对秘书长的建议采取行动,该建议提出一个改革的了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就可能危及和平与安全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此外,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进行调停的能力。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尽管在《宪章》下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但它们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直接调解冲突的最适宜的工具。在实践中,秘书长曾多次任命一位代表对个别危机进行调停,在通常情况下都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我认为,象这种安排建立在一种更加有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不妨通过组成一个调停机构的方式来完成,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可将困难的问题提交该机构处理。该机构在同秘书长协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其作用不同于国际法院,因为它将发挥政治调停,而不是根据国际法作出裁决的作用。我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在吸收具有调停技能的人才并且在有效的工作人员和适当资源的支持下能够迅速获得一种技能和权威,从而大大提高联合国的建立和平能力。

联合国目前从事着更多的维持和平行动,并且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的人员在实地。爱尔兰参加了许多这样的行动,并将其国防力量及其防卫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致

力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维持和平行动经费不足以及某些会员国仍未支付其分摊份额尤其表示关注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更深一层和更加重要的原因。秘书长曾经提出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许多新的要求方面寻找人员的困难。最近的经验表明,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不再能确保一项行动将迅速得到开展。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本组织在危机爆发时不能迅速开始一项行动更为严峻或具有更大的损害作用了。危机本身逐步升级,失去控制,因而联合国的可信性使受到怀疑,安全理事会的权威也受到损害。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确保各项活动具有适当的资源,各部队派遣国能够就参与作出决定并有把握它们得到足够的支助,并且在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具有更多的协商。

维持和平的耗费总是比战争的耗费要少。彻底解决这一对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关键的限制恐怕是纪念五十周年的最佳方式了。

随着我们对内部纷争的理解的加深,我们逐步看到人权领域的行动在防止和解决冲突方面所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将维持和平与人权合为一体所具有的价值已经在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其他地区得到证实,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迄今还只是零星的和暂时的。甚至在卢旺达,我们仍在等待着部署足够的人权监督人员。必须为这一活动找到资源。爱尔兰准备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设立的卢旺达志愿基金作出捐助。

设立一个有效的对侵犯人权事件进行监督和裁判的有效体系具有明显的必要性。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发展组成一个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汇报的常设人权监督员小组。这会使人权行动与维持和平行动更容易融为一体而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可以包括人权的内容,并伴随着明确规定的报告与核查程序。

此外,我们现在应就设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行动。联合国必须表明,它具有将那些对危害人类罪行、草率处决、酷刑、强奸和致残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的意愿。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未能汲取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教训,并且我们当然还会冒它们得到重复的风险。

我们解决战争和内部纷争的努力不能忽视《和平纲领》所描述的冲突的根源:经济上的失望、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压迫。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维护和平是办不到的。相反,

发展倒是和平的最稳固的基础。

卢旺达和索马里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不能是偶然的。因此,当秘书长本人告诉我们发展正处于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洗耳恭听并且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即在发展方面除了联合国,根本不存在其他替代途径。

事实上,发展纲领与《和平纲领》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同一事务的两个方面,并且如果我们想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的话我们必须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进步。

被称之为“发展文化”的思想必须超出仅提供财政援助,以包括经济进步、环境、社会公正、民主和良好的治理。在明年的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妇女会议期间,我们能够在环境与人口会议已经取得的进步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战争和内乱的悲剧突出了更加认真解决裁军问题的必要性。武器的轻易获得不仅导致冲突中屠杀和灾难范围的扩大,而且导致冲突本身的爆发。

国际上主要常规武器的贸易量近年来有了下降。但是,在一些地区储存了大量武器。在另一些地区军火贸易继续增加。

有必要使各国在武器转让方面负起更大责任并实行克制。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已使其具有更大透明度。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走得更远。因此,爱尔兰建议联合国应该制订常规武器转让的行为准则,确定在这方面应该遵守的共同原则。我希望大会现在将作出决定,着手制订这一准则。

地雷的滥用使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大片地区变得不安全。自去年以来,许多国家政府暂停出口杀伤地雷。我欢迎克林顿总统作出的达成一项协议以减少获得这些地雷的可能性与数量的呼吁。

我也欢迎在削减核武器与达成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主要大国之间核冲突的威胁再也不会笼罩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还想获得核武器的能力。世界上可裂变物质储量的增加与具有必要技能人员的增多有助于它们这样做。

明年的审查与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议将提供机会讨论这些问题。爱尔兰要求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我们希望,正如该条约所设想的那样,条约所基于的原则得到维护,不扩散制度得到加强,各国都成为成员国,并且在全面消除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

联合国改革的议程对于该组织本身和组成本大会的各国

来说是庞大的。但不管存在什么困难,改革是极为重要的,是紧迫和必需的。我相信,除非我们采取广泛和富有想象力的行动,把联合国的政治、维持和平、发展与人权职能结合起来,否则我们将证明不足以对付当今巨大的挑战。

我们现在具有一代人所不曾有的机会。我敦促大家抓住这一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爱德华·库坎先生阁下发言。

库坎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科特迪瓦的埃西先生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我祝他成功履行这一责任重大的使命。

我同时要感谢埃西先生的前任英萨纳利先生阁下为上届会议的成功作出的巨大个人贡献。

我也要借此机会深切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作为联合国的首脑做出的一切工作和努力。

允许我在发言一开始作一番个人评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世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国际生活的动态也反映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在过去四年中,我是两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今天,我感到荣幸和自豪的是,担任其中一个国家——我的祖国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提名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为外交部长再次表明联合国在斯洛伐克所得到的尊重。

我国在加入联合国之后不到两年就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一员,这一事实确认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功绩,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尊重国际法与各国间民主共存的原则。这也是因为我们执行产生于斯洛伐克社会价值观的各项外交政策原则。这些价值观的特点是尊重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

斯洛伐克是地理上处于敏感位置的中欧地区的一个小国,其外交政策显然必须具有透明度与明确确定的方向。因此,我们活动针对的是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并争取加入稳定、民主和繁荣国家的行列。加入欧洲联盟与积极参与制订有效的欧洲安全模式是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主要重点之一。

当然,我们的国际接触要广得多并更具有多边性。我们有兴趣同邻国建立最好的关系。我高兴地指出,我们最近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我们认为,次区域性的安排,例如维舍格勒四方协议或者中欧协倡议,也有助于加强整个地区的

稳定。与西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方面的密切接触正在得到加强,这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欧洲地区的一部分,其全球性的优先考虑问题是维护牢固的跨大西洋关系,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同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发展深入的合作关系。此外,我们认为同东边邻国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尽管斯洛伐克是一个中欧小国,但我们仍努力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合作。

我们的任务和目标要求很高,其实现取决于公众的充分支持和主要政党的共识。我高兴地指出,在斯洛伐克公众和政界对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这对外国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它们可以信赖斯洛伐克,把它当作可靠的伙伴。

正如我在发言一开始所指出的,由于国际关系的日益多极化,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去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促使国际社会努力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保证各国的和平共处,但也有一些事件使我们不能感到乐观。

中东的和平进程是一个积极事件。斯洛伐克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进程,以便全面和最后地和平解决阿-以冲突。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的关于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提供有限自治的协定以及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关于终止战争状态和解决相互关系的措施的宣言再一次证明,有关各方以及确信能够恢复这个区域的和平的国际社会方面所进行的和平努力是正确的。

我们还欢迎今年5月的选举所表明的南非社会的民主化。尽管南非和斯洛伐克离得很远,但我们特别重视使这一发展继续下去。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访问南非以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就证明了这点。

在另一方面,即使这些积极的例子也将不会帮助我们成功地结束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在离我国边界大约300公里的地方继续发生的冲突使我们深感关注。斯洛伐克是渴望结束该国持续的悲剧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强调,政治解决办法优于军事解决办法,因为后者从定义上讲无法消除对立各方之间的敌对。

斯洛伐克共和国作为一个把核能源利用于和平目的的国家,是一个无核武器国。我们因此支持迅速签署全面禁试条约。我们希望强调,这样一项条约应该毫无例外地和无限期

地适用于所有试验,包括和平目的的试验。斯洛伐克认为,使核俱乐部的所有成员继续暂停核试验是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主要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它也是核俱乐部所有成员真正意图的一个明确迹象。

我们认为,明年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是和禁止核试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扩散条约》一直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成功地制止了核武器的扩散。我们明确支持无条件地和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条约》。

斯洛伐克共和国赞赏联合国在军备,无论是常规军备还是化学和生物军备,的透明度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我们欢迎在常规武器方面所采取的第一个积极的普遍性步骤,即建立常规武器登记册制度。

对现有多边条约的核查水平在多数情况下或是不适当,或是不彻底。许多关于军备控制的多边条约没有列入核查条款,而那些列有这些条款的条约并没有象《不扩散条约》那样充分利用核查手段。我认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将是新型的多边裁军条约进行的一个尝试。批准这项协定是我国议会议程上的头等大事之一。

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斯洛伐克正在负责地和及时地履行其在世界性和区域性谈判论坛上所承担的关于建立信任、安全、控制军备和裁军的义务。我们坚定支持所有裁军活动;因此,我们非常了解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想进一步证实斯洛伐克共和国将一贯关心解决其在该会议的成员资格问题,因为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是该会议的创始成员之一。一个其军火生产已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9%的国家仍然不是该会议的成员,这实在是说不通的。

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善联合国和作为《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意义上的区域安排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之间的现有组织体制,并加强二者之间的合作。欧安会正继续使自己适应新的现实。然而,斯洛伐克认为,欧安会的基本性质不应改变。它应该仍然是一个广泛的政治论坛,其基本原则,即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定,应该保持下去。

当前的维持和平行动可能已达到了国际社会能够提供和保持的最高水平。这些行动耗尽了我们的财政资源,而同时甚至连人类的生命都不能挽救。最初对维持和平行动抱有的热情已逐渐冷却下来,因为人们意识到,存在着许多联合国克服不了的障碍。在卢旺达的悲剧性局势中,即使驻扎

着联合国部队也无法避免内战和屠杀,这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斯洛伐克共和国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中派有一支有600个士兵的部队,他们是工程部队的成员,其军事任务包括提供高度专门化的专家工作和援助,以便重建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他们在进行维持和平努力的同时,还担负了危险的在该国排除地雷的任务。

斯洛伐克强烈支持克林顿总统于星期一在大会发言时呼吁缔结一项将减少杀伤人员的地雷的数目和供应的协定。我想指出,斯洛伐克已经根据第48/75K决议于1994年4月17日无限期地停止出口杀伤人员的地雷。

在联合国为解决维持和平行动领域的若干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方面,斯洛伐克共和国欢迎建立可以紧急派遣并由联合国指挥的后备部队的决定。我们已经宣布,我国有兴趣向这些部队提供斯洛伐克陆军的工程师。这些部队需要有专门用于特别目的的高度专门化和彻底的准备以及训练。我国正在建立这样一个训练中心,今年5月份以来,已经利用该中心训练了1 200多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

经验表明,传统形式的维持和平行动已不再能满足需要。如果一个维持和平行动要成功,它就应该包含一种人道主义因素。斯洛伐克认为,在任何有联合国主持并由联合国协调的行动中,必须尊重联合国司令部优先的原则。

在关于联合国人员遭到攻击的事件有所增加的问题方面,斯洛伐克共和国表示赞赏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决定制定一项国际公约来处理联合国及有关人员的安全问题。联合国应该考虑的下一个步骤是向维持和平任务人员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使他们能够更适当地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能够进行自卫。

斯洛伐克共和国尊重人权并对能够在这领域内产生成效的所有国际倡议表示欢迎。我们高度赞赏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开始的各项活动。我们认为这一职务将使联合国用以保障保护人权的一种积极的工具,特别是在人权遭到最肆意破坏的地方更是如此。在1994年年初,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开设了斯洛伐克全国人权中心。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感谢荷兰在设立这一机构方面给予的援助。

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在继续增加。我表示希望联合国将不会低估这一问题并希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不再需要为今后的财务问题进行斗争。

斯洛伐克共和国支持改革联合国的工作。它认为重整和改组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我们希望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增强安全理事会的效能并能对全面加强联合国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新的常任理事国必须负起全球性的责任并能担负随之而来的财政义务。

在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任务并实施制裁的时候,应该对各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给予更大的注意。我们相信,对受影响各第三国有有效的援助机制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并尽早予以设立。

斯洛伐克在改革社会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在转变进程中在规模和方式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联合国及其各组织和各专门机构一起在协助它们解决这些问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要谈谈一些关于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形势的事实。由于采取了初步的基本改革措施,斯洛伐克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永久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并在今后几年之内为重大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我国有530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大约50%供出口,可视为一个小型的开放型经济国家。斯洛伐克政府正在集中加速改革,以便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尽快产生转变。在1994年前6个月期间,在微观经济稳定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国内生产总值实值已增加了4.4%。国家预算赤字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8%,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指标。由于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合作并得到它的援助,中央银行的外币储备已经增加。这些资料被认为是经济复苏的初步迹象。

经济合作以及其框架内的国际援助是在过渡时期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与我国政府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由于这种合作,经济形势已经比原先预料的要好得多,因此,斯洛伐克共和国已成为在经济合作方面被接受的国际伙伴。

斯洛伐克共和国对联合国旨在突出发展和经济合作问题而增强的注意力以及加强的努力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发展纲领在这方面开始采取具体的步骤。我们特别赞赏联合国作出了努力协助解决正在转变其经济的国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联合国框架的范围内有着更多的机会来促进和加速这些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在过去十年期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增加得令人可

怕。这种情况的结果是要对全人类特别是对工业发达国家作出紧急的呼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避免最不发达国家对它们自己的命运所承担的主要责任。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它本身的财力和可能性的范围之内特别是通过斯洛伐克专家参与例如教育和保健等发展项目的办法而提供的援助。斯洛伐克愿意从事1996年根除贫困国际年的组织工作。

我要强调指出,最近结束的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重要意义。它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协议并通过了最后文件这一事实是一个信号,即国际社会意识到它对人类全球性问题的责任,而国际会议和讨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战场,无论这些问题是多么的敏感和复杂。

正如从我所提到的事实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斯洛伐克作为联合国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不但希望“获取”而且还打算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项目并有着参与的能力。我国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斯洛伐克专家有着他们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他们愿意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发展项目。经过严格条件检验的斯洛伐克商品和技术可以促进这些发展项目的效能。在人力资源的发展领域内,斯洛伐克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大学里开设了各种课程。

我国要履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改革经济。联合国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自己适应新的现实并相应地调整其结构和活动。我希望向大会保证,斯洛伐克共和国愿意竭尽全力执行第一项任务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在结束讲话时,我预祝大会今年的会议圆满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朱里·卢伊克先生阁下讲话。

卢伊克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埃西先生当选为第四十九届大会的主席。爱沙尼亚人民祝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切顺利。

今天是我国全国哀悼的日子。昨天深夜,从塔林驶往斯德哥尔摩的爱沙尼亚号客运和轿车渡轮在秋天的风暴中沉没于深海。近100个人得救了。抢救工作仍在进行。但是大多数爱沙尼亚号渡轮上的850多个人大概已经身亡。我谨向主席以及所有表达悲伤和哀悼的人表示感谢。

在这个痛苦的损失中,我们可从抢救工作中看到的全球配合得到一定的安慰。昨晚无疑地表明,波罗的海是和平之海。瑞典、芬兰、丹麦和爱沙尼亚抢救队共同工作,我们并且得到俄罗斯、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和无数其它国家帮

助的表示。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所有协助我们进行抢救工作的人。这种国际合作精神为我们所有今天在座的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今天我国来到这个论坛时,他在这个世纪中第一次不受外国军队驻扎我国领土的问题的束缚。联合国在协助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最后残迹上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我特别荣幸地今天在这里发言。

还具有意义的是,这个爱沙尼亚、拉特维亚、和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发生在联合国即将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这两项事件似乎要求对过去进行严肃的反思或者至少是值得愉快庆祝的时刻。但是首先,这个新时代要求采用新方法。战争后的安全——无论是热战或冷战——仍微妙地摇摆不定。由于天平往哪边倾斜,这都由我们所有人集体决定,我希望集中地谈谈未来,我们爱沙尼亚人如何对待这个新时代,以及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中应特别注意的载于《联合国宪章》的一些概念。

我们在8月31日庆祝了外国部队的撤离。这个庆祝和纪念活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部队的撤离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们更接近与俄罗斯联邦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真诚地希望能解决违背部队撤离条约的精神和文字而在我国领土复员军官的问题。部队的撤离也是朝着实现波罗的海安全的重要步骤。但是波罗地海安全的问题尚未解决——还远未解决。

真正地走向安全的一个方面无疑的是努力改善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善意的潜力尚未实现,因此1920年《塔图尔和平条约》的双方有责任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实现那个和平。我们可以称呼这个对俄政策为积极接触政策。这将涉及,除其它因素外,尊重主权,相互尊重国家安全利益,相互避免进行口头和其它方式的对抗,以及互相尊重国际行为准则,特别是在人权领域里。

我们愿意用相当大的精力修补历史上曾经是十分复杂的关系。这样做不仅符合我们自己和俄罗斯的利益,也符合本地区、欧洲以及全球安全的利益。然而我谨强调,为使这项政策获得成功,双方必须努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努力得不到回应,那么我们必须准备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们的精力。

最近我们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关于建立新势力范围影响的谈论。我们听到有人继续使用“接近外国”一词。我们

观察到在关于扩大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欧洲联盟的讨论中出现了同样的态度。我们早已超过了建立欧洲安全结构的初步阶段。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念和包括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的可行的框架已几乎形成。考虑那些谈论势力范围的建筑师们的方案并且与想在沙子上或且更糟糕地在滑坡上造房的承包商进行磋商,不但已为时过晚并且也是不可接受的。

联合国有一些具体办法可以用来利用它所面临的这个历史机会以鼓励有原则的行为。其中之一是,通过加强维持和平机制,包括向所有会员国更及时地传播信息以便取得集体行动所需的支持从而使维持和平活动更为有效。这意味着使各地区的所有会员国遵守同一标准,而不是出于善意忽视、权宜之计或者资金问题而放弃职责和允许大国单方面行动。不言而喻的是,任何以联合国名义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必须遵守中立和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永远不应成为一个国家企图通过维持和平手段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控制的假面具。

请允许我补充说,爱沙尼亚正积极地发展自己的维持和平部队,明年可能可以提供给联合国秘书长使用。

正如《维也纳宣言》和去年的行动计划所反映的那样,需要更有效机制和更严格标准的另一个领域是人权。我要强调新成立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从事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祝高级专员阿亚拉·拉索在这项最重要和最富挑战性的努力中取得成功。

我们认为,高级专员可以不仅有助于改善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使该机构坚持严格标准。我们认为,应该依照同样的人权标准衡量所有国家。我完全同意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两天前在这个论坛提出的观点即:

“有选择的做法和双重标准都是不允许的。”(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第5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英文第8页)

的确不能在一国大小、其文化遗产和局势的政治微妙性基础上规定例外。对一国适用的标准必须对所有其他国家都有效——换言之,应该没有任何弹性的尺度。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醒大会注意一封由一些杰出政治人物签署并在去年9月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它确实是一封提醒大家在外交政策中注意道德的呼吁书。我引述这封题为“西方在波斯尼亚必须作什么”的信:

“即便将1990年8月的科威特那样,整个波斯尼亚(不仅萨拉热窝)都被占领,民主国家必须象在科威特那样表明,以暴

力改变边界和种族清洗绝不能维持下去。如果西方不表明这一点,他就没有什么话能说服人……”

可悲的是,这封中的信息今天仍然适用。如果联合国所领导的世界各民主国家不说话支持人权领域的道德,我们就会丧失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民主国家必须愿意支持作为我们这些国家和社会基础的各项原则。我们衷心希望,不选择地适用人权标准将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

联合国可以利用目前时机的第三个办法是审议自1945年以来发生的全球变化。当时,在战后初期,安全理事会的构成是通过明确划分战胜国和战败国而建立的。时代已经改变。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某些国家在国际领域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此我想到的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五十年中已充分表明了他们对民主的承诺。爱沙尼亚强烈支持在安全理事会中给予德国和日本常任理事国地位,作为对他们的成就及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定作用的一种承认。

我现在要扼要论及爱沙尼亚对其在联合国今后作用的想法。鉴于迄今曾要求我们密切注意的问题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解决,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影响我们大家的更广泛问题。这里我谈的是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卖毒品、走私放射性材料等全球现象以及保健和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些都是没有边界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作出集体努力。

在联合国五十周年前夕,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战争——我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但真正的战斗——即捍卫所有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加强各国的安全和维护一个不分裂的大陆——却只是刚刚开始。通过智慧、毅力、善意和一些运气,在此聚会的各国可以在战斗中团结起来,以便使今后五十年比前五十年更具有建设性。

阿拉尼巴尔·基罗加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贡萨洛·桑切斯·德诺萨达总统和玻利维亚人民,向参加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向各外交部长、向大会主席巴马拉·埃西先生及其前任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并向我们亲爱的朋友副主席塞尔基欧·阿德勒,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以及由高尚人物在此作为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表示问候。

作为地球上各国人民的最高论坛,崇高的大会是思考和辩论我们当今问题的理想环境。

玻利维亚正在努力在庆祝21世纪时实现基于《联合国

宪章》各项原则的重大变革。

桑切斯·德诺萨达总统的政府在职第一年就致力于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使国家成为促进以我国人民福利为中心的我国社会民主发展的有效工具。因此,我们的改革是以全面发展概念为基础的,并把人和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持久发展结合起来。

鉴于玻利维亚已这样完成其政治结构改革,它现在正在推行使其能够在公平和社会正义条件下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革。

我国已经实行一项人民参与的有力政策,开始了教育改革进程并通过创新的资本化概念重新塑造国营企业的股份制和生产结构。

玻利维亚政府在其方案的第二阶段,正在计划执行新的旨在增加投资和生产的法律规定,以便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工作机会,并具体解决社会各界广泛的贫穷和边缘化问题。在这方面,即在我国政府政策的范畴内,人民的参与尤为重要。

关于持久发展问题,我国已提议召开一次半球总统会议;现已订于1996年在玻利维亚召开这次会议。

我们各国人民的未来及其物质和精神福利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双手创造,因为他们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对象。因此,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不仅在我国内,而且在联合国系统内,都有一种信念,即个人和集体的有组织参与要起中心作用,它是朝创造性和积极方向变革的一个基本因素。

群众参与的机制将使得各国的自由、独立、主权和进步充满生命力和社会内容。这是一个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作用评价的问题:工人和企业家、妇女、土著和农村社区、受排斥者、年青人、老人、残疾人和所有那些有权并有责任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的人。

玻利维亚政府出于这样的信念,对将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同年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着同样的精神,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将在大会本届会议开始。我国相信,纪念这一十年将不只是象征性的,而基本上是在其目标和范围方面做出的实际和具体的努力。为此目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政府、基层农民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代表今年6月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举行会议,拟订了将写进该十年战略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也已经提交给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我们希望将得到迅速和积极的反应,

以使土著人民的合法要求不会失落在国际官僚机构的迷宫里,或是又被孤独遗忘一百年。

解决年代久远的问题必然需要有更大的能力来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习俗和生活方式。玻利维亚希望,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充分了解古柯叶的议题,这是安第斯区域一种传统的植物。需要重新评价古柯叶的文化和医疗用途,以便把它同发达国家滥用它的一种提炼物质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清楚地分开,这种社会问题造成了同国际犯罪周期有关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让我借此机会再次正式宣布,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真诚和坚定地致力于国际努力,以寻找最合适的机制来保障上届会议通过的大会第48/12号决议所建议的各项改变范畴内的政策的成功。

在不到两周前,根据桑切斯·德洛萨达总统的倡议,玻利维亚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同武装部队和警察一道采取了一个历史性的步骤,他们在多方参与和合作下就古柯叶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我冒昧地向这一伟大的国际论坛总结一下那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它强调迫切需要通过分享责任的世界战略同贩运毒品作斗争;需要把同波及玻利维亚三分之二人口的赤贫进行的斗争作为首要目标;并支持旨在全面发展生产古柯地区的倡议。

玻利维亚感谢国际社会愿意在土产古柯叶的积极方面同外部对可卡因的需求造成的严重伤害划清界线。我们相信,这种积极的态度将使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不存偏见地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本世纪的国际议程包括最近由于冷战结束而暴露出来的其他同样复杂的问题,尽管其根源可追溯到数世纪积累起来的非正义之中。

南非共和国使世界获得了同种族隔离作斗争和争取民主的宝贵的教训。我国对这一进程的结果感到高兴,我代表玻利维亚欢迎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到大会来。

我们对卢旺达和世界其他区域发生悲剧的消息深感不安,玻利维亚向那里的人民表示声援,他们通过暴力和灾难向我们表明,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我们将埋下什么样的种子——这些问题包括饥饿、贫困、大规模迁徙和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和甚至在今天大小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掠夺和非法行动。

玻利维亚欢迎中东通过对话取得的进展,我们相信,今

后对话将成为成功地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主要工具。玻利维亚人民希望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之间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但愿大会的审议将对巩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前南斯拉夫和其他地区的局势直接产生于为了错误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在外国领土上制造社会和政治动乱的行动的直接后果。我们希望,无谓的重复这种在中欧、亚洲和非洲造成如此痛苦影响的做法将不会导致在其他区域发生类似的灾难。此外,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以最强烈的语气谴责“种族清洗”的政策,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和明确的措施,停止那些行动并惩罚罪魁祸首。

根据最近的里约集团总统首脑会议的宣言、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及整个大陆所有国家的议会和人民组织的无数宣言,拉丁美洲无条件支持民主和反对非法使用军事手段和武力。

当然,民主不能不予捍卫。玻利维亚体制的生命中曾经有过长期独裁统治的痛苦经历。因此,玻利维亚今天站在海地人民及其合法政府一边,支持让-贝尔特兰·亚里斯蒂德总统的立即回国和恢复民主政权。

历史表明,和平、正义与尊重自决原则要得到保障就必须有能够捍卫和促进安全的牢固的民主体制。不能只在讲台上表示声援。我国重申,只要海地合法政府认为帮助是有益的,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帮助恢复该国民主的进程。

结束冷战也应该适用拉丁美洲,并通过有关方面之间的对话和谅解,使古巴能够重新纳入美洲社会。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确保和平、兄弟关系和及时解决各种尚未解决的问题作出贡献,为此目的,必须采取行动,使人民得以发展,因为经济落后及其社会后果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和冲突的根源。

因此,我们把“发展纲领”的主题放在高度优先地位。经济上相辅相成,转让技术,贸易,开放经济,外来投资与合作应该成为我们加强各国人民和政府间的团结和友谊的手段。

本着这一精神,玻利维亚强烈支持拉丁美洲团结和次区域一体化,半球协定以及可能出现的任何国家间交流的机会。

这些目标——合作与相辅相成、友谊与团结——必须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为此,在旧金山签署《宪章》50周年的纪念应该是一次机会,以便在使联合国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现

实和要求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世界各大洲的各国政府必须显示出使后代免遭战争之祸的能力。我们必须使,个人和集体的人权充分有效。必须使国际正义变为可能,并得到保障,必须在最广泛的自由概念内促进社会进步。

在国际关系的第三个千年期中法律不能再成为强制的手段被用来巩固非正义;法律必须成为解决争端、纠正上代人的错误和过份行为的唯一和有效的手段。

在国家间关系规则的问题上,玻利维亚欢迎《联合国海洋法》生效,欢迎1998年将成为“国际海洋年”。坚信恢复我国进出海洋是玻利维亚不可剥夺的权利,桑切斯·德洛萨达总统政府正在努力,争取在这十年内为玻利维亚人民真正解决我国一百多年来属于内陆状况的不公正局面。我国相信信念的力量,相信国际团结的力量,相信法律的力量和演变,相信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在国与国关系中必须清楚地表现民主。大小国家必须平等参加影响所有各国的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象有时发生的那样,仅仅在口头上参加。

但是,这样做的前提,除其他事项外,是改变安全理事会的组织和组成情况,以便它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能够代表现实状况和适当参与的要求,反映世界不同地区显然已经出现的新的力量中心。还必须加强大会的作用,恢复联合国在解决地球上重大经济问题方面的中心作用。目前,这一任务成了超级大国的专属领域。

发展的权利是客观的需要,虽然对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来说,行使这项权利看来仍然遥远。我们必须作出有效的承诺,象对待个人的人权那样优先对待这项权利。

如果目前这代人不能战胜日益扩大的贫困,为已经庞大的世界贫穷大军确保就业机会,就不可能确保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和平与福利。人口的增长、大规模迁徙和全球化将会造成损害,对全人类的尊严、和平共处和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带来消极的影响。

几个世纪来,玻利维亚的安弟斯人民有三项基本准则英明指导,用盖丘亚语说,就是:“AMA SUA AMA LLULLA, AMA KHELLA”,意思是“不偷,不懒,不撒谎”。

如果把这三项规则也用于今天的国家和民族间关系上,那就应该是:“不要不公正地剥削邻国的劳动成果。不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心安理得地享受你辉煌的生活方式。不做

你不准备兑现的声援和谅解的承诺。”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以这样的规则为指导,我们大家一起生活的能力将得到极大的加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长斯泰夫奥·茨尔文科夫斯基先生阁下发言。

茨尔文科夫斯基先生(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埃西先生当选,并祝愿参加这次大会的与会者工作成功。我也赞扬秘书长对我们组织的干练领导。

在今年这届会议上,大会将处理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许多问题。为了不断加强联合国作为一个具有不可取代的特点的普遍性组织的作用,每一个会员国都必须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世界,为改善本星球上各人民之间的关系,作出最大的贡献。本着这种精神,我国马其顿共和国,准备用我们所有的微薄力量,为实现这些对各国普遍有利的目标,为改善联合国组织的运作和作用作出贡献。我愿向大会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为此目的作充分贡献。

在马其顿共和国,人们对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将导致通过《发展纲领》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确信,本届会议的工作还将对克服世界的严重危机和冲突产生积极影响。总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进步和人类繁荣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

本世纪最后十年世界上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问题明显突出。一方面,人类合乎情理地希望高度发达国家保障经济进步、社会安全、人类尊严和健康的环境。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正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问题,摆脱贫困、经济绝望和不安全的问题。

包括我国在内的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正在经历痛苦的时期,试图在市场经济和民主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此外,混乱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新的、压制性和非民主的局势的威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负担。

这种有争议的国际形势暴露了国际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极端复杂性,因而也提出了如何摆脱这一局势的问题。我敢肯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既不采用各种新意识形态概念,也不采用按区域或政治分界的新的分裂概念,更不采用以虚假利他主义和乌托邦蓝图为基础的在各国间分割

职权的观念。”

只有承认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我们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是一个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默不关心的事实,不论其大小,发展水平。欠发达世界的经济问题显然对发达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此外,解决欠发展问题显然不能靠社会援助或馈赠。相反,全球经济及社会相互依存的本质使我们意识到,发达国家帮助欠发达国家解决其问题,事实上是在帮助自己。因此,应通过相互责任和最好的世界市场条件下为经济发展和民主开辟前景,解决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处境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讲,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结束以及1995年初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组织确实令人鼓舞。我相信,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将促成世界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加强世界贸易体系,因为降低和消除世界贸易的壁垒将不仅是欠发达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有机会找到现实的出路,而且将为世界贸易的全面增长及经济合作提供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进行努力,增加用于发展的国际财政资源,解决拖欠会费和还本付息的紧迫问题。这些将是解决欠发展问题非常具体而积极的步骤。

处理这些综合性问题时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个全球性因素:保护环境和人口状况。不考虑这两个因素,就不可能制定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球纲领,人类也不会有任何前途。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强烈地突出了区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性。其前景和优势是不容置疑的,联合国应给予协助和鼓励。我国支持此类政策,并认为这种支持将扩大其自身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景。

我遗憾地注意到,尽管进行了各种有意义的努力,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发表的《宣言》仍未得到预期的执行。世界上的人权仍受到残酷、大规模的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卢旺达的悲剧令人沮丧的证实了这一事实。在许多国家,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到侵犯。种族主义、种族和宗教歧视政策仍广泛存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也有目共睹。最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都成了发动战争、大规模谋杀无辜人民和破坏城镇村庄的理由。

我国所处的巴尔干地区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例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在继续。国际社会、安全理事

会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努力不能使波斯尼亚塞族相信,和平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诚然,和平力量在增长。但是,本地区的不可预测感仍然存在,甚至在加剧。很难设想,前南斯拉夫地区局势的解决办法不包括新独立国家完全相互承认并建议外交关系。

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使邻国的经济状况受到严重影响,该地区的经济联系已中断,急需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巴尔干南部的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今年2月希腊对马其顿共和国实行单方面经济禁运。这是典型的经济侵略,目的是在有关马其顿民族特征的问题上强加其意愿。最近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以及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事态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我们对所有这些因素极为关注。

国际上的有关方面以及安全理事会正在给这一局势以应有的重视。我愿重申部署在马其顿执行预防任务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积极作用和贡献。这是为维护和平采取的非常成功的行动,应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马其顿共和国奉行和平政策和立场,是该地区的稳定因素。我们正不遗余力地表明,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动乱的地区,其他解决办法也是可行的:通过人权和少数人权利保障和平;各民族可以实现共处、宽容和相互理解;各国间发展更稳固的关系,只要通过平等合作尊重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只有通过对话和政治手段才能成功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在巴尔干摆脱历史困境和战争迷途的唯一出路是实施开放边界、一体化与合作等新欧洲模式的原则。

因此,今天巴尔干地区需要在以下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防止战争蔓延并建立永久的和平基础;加强所有国家和整个地区的民主进程,尤其是加强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意识;鉴于大多数国家现在处于转型期,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将它们纳入集体安全机制。

本·亚希阿(突尼斯)(副主席)主持会议。

巴尔干地区最严重的威胁是出现了以宗教或种族为基础的重新组合和新的分裂。巴尔干不能依然是欧洲和世界集团分裂的一个现存的遗迹,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它将成为对该大陆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公开威胁。避免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国际社会在我们区域采取预防行动,其形式不仅是派出监督团,而且还可通过具体的政策达到我们的目的。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希望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将有

助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睦、地球的生存和保护、以及全人类的利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塞舌尔外交、规划和环境部长达尼埃尔·德圣若尔夫人阁下发言。

德圣若尔夫人(塞舌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谨向你表示祝贺,并祝愿你在执行你的任务时取得圆满成功。

塞舌尔还要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为促进和平、正义和发展不断及时采取的明智的主动行动。

我们聚集在一起表达我们所代表各国的深刻愿望。我们都有我们的具体问题、我们的分歧、我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都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们产生于一种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变得日益频繁的国际形势。

在我们目睹当代历史形成的时候,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踌躇往往会引起一种悲观情绪。

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那些仍然在发展的道路上停滞不前的国家之间,有很多障碍正在阻碍共同分享和团结的道路。

在以前被兄弟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民族之间,我们现在看到残酷的纷争正在出现。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正目睹不同利益之间的无情对抗。在各种相互关系中,我们现在把人的因素放在什么位置?

在本世纪结束之际正不断交替出现产生于消极态度的冲击、动荡和各种侵略。

我们各个社会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些冲击,并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情况下重新鼓起勇气,拿出决心和毅力,尽管有时非常缺乏相互谅解。

但是,我们还必须重振我们的能力,重新投入我们的资金、手段和内心的意愿。换句话说,必须建立前所未有的同盟,因为我们不能再对我们将要留给我们的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高谈阔论。由于历史进程史无前例的加快,中期的人口、经济和社会预测使我们震惊,但长期的预测就不再引起我们这样的反应,因为由于我们只顾一己私利,对无法预见的事情视而不见,我们对它们已经习以为常。

这种迅速增长的现象正使差距加大,并鼓励争斗,它引起了立即而不是延缓的反应。我们已成为我们自己行为的

承受者!毫无疑问,这一观点比许多言论更值得思考。

这说明了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的努力必须是有计划和创造性的。这还意味着应该处理的紧迫问题是确定我们的优先事项。在此,我的想法与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许多意见是一致的。当然,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和繁荣的世界不乏其人。有许多会议和讨论会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并在它们的最后文件中回顾了这一思想。但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因此,我们要求实行一些行动方案来调动我们的经验、力量和想象力。如果说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扩大各种项目的基础,对结果进行评估,并提供新的援助。

换句话说,我们所主张的是一种明确的规范性办法,而不是一种分析和描述的做法,后者是许多国际会议所采取一种稳妥的路线。

如果我们具体地确定我们审议的领域,那么由此产生的行动必定以准确、有益和所需的动力为基础。

在塞舌尔和全世界30多个领土的情况中,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具体问题就是地理面积小和人口少以及作为一个岛屿的双重限制。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小岛屿国家的情况在许多方面能够显示人类的未来。在这里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由于它们的脆弱性——无论是脆弱的生态系统、过少的经济出口、还是缺乏人力资源——任何依赖状况必定给有关社会的未来造成影响。

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会议的确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助益。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一些小国的特殊情况。它们的相对人均高收入并不能准确反映一种状况的真实面目,而捐助国往往把这一状况与任何发展援助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给小岛屿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仍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这次会议将导致工业化国家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独特情况的态度有所变化,因为正是工业化国家必须处理和详细探讨小岛屿国家的关注,并且使那些构成变革或发展唯一真正动力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开始得到实施。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把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挑出来加以批评,但是在里约首脑会议过去两年后,我们仍非常失望地看到,《21世纪议程》的条款很少导致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由

于缺乏国际支持以及不能履行诺言,持久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受到严重影响?

让我们看一下问题的核心。协调发展政策和保护环境措施必然意味着以国家努力和国际努力的相补性标准为基础按优先次序确定具体的预算类别。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避免任何施舍精神以及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的审评。

让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即在一个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性的时代,各国的个别和集体责任要求我们采取全球性的方法、公平地分担费用和环境所代表的道义投资。必须认真履行这些责任。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引起决策机构和国际捐助者毫不动摇的重视。过去,许多声明都以乐观的调子结尾,这些调子连接成的协奏也只能是歌颂发展的老调重弹。这种老调重弹像声称良心清白一样听起来往往空洞虚伪。

但是,我们不怀疑我们谈判伙伴的智慧,肯定有人喜欢以辩证的观点对待发展问题,但是我们并非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做的是毫不犹豫地说得具体些,那么我们的回答的是我们将寻求实在、有意义和可以衡量的措施。

推而广之,这也适用于妇女在发展进程中应发挥的作用。这不是新的辩论。幸运的是,妇女促进进步不符合传统这一观点已成为过去。但是,废除一项原则虽然为许多方面的改进铺了道路,但也可能产生相当大的惯性,因为众所周知,虚伪之墙非常厚实。举一些妇女成为企业家或决策者的例子是不够的。总会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妇女。重要的是在社会一级真正改变行为和作法,分析并推广时常导致良好结果的模式和概念。这就是我们对北京会议的期望。

至于自然的优先权利,我们当然不能说下放权力,相反,在这方面也是公平、负责任的分享权利。实际上难道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妇女必须在其社区内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采取行动,这种力量能接受变革,丰富与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有联系的动态进程。生育而不关心生存、不深刻理解变革是不可能,因为变革在产生不确定和扑朔迷离的情况时对个人或社会都产生影响。

显然,人文主义应感恩妇女。让我们以我们的谅解丰富人文主义。妇女有很强的特性,但在许多地方仍然未能受到承认和表达,而这种承认和表达是妇女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合理性的理想除了是一种妥当的、使用观念以外,还是

一种崇高的概念。盼望实现庄严的宣言中所做的承诺是合理的,期望如此勇敢果断地表达的意向将成为诺言是合理的,在事态紧急,没有任何时间宣布意向或承诺时采取行动也是合理的。可以在事后再达成协商一致。

在此,我本着同一精神强调,我们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建议感兴趣。他建议只要有呼吁,就迅速采取人道主义行动。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为“自发反应”。我们这里谈到的又是使人类具有尊严并值得尊重的合理性。

最后,我仅呼吁出席大会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团结努力,为实现世界大同采取重大步骤。让我们废除各种自私自利的顽固壁垒,让我们关心他人的需要和我们地球的未来。让我们为积极团结和自愿遵守共同责任的原则发展我们的关系。

在此项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发表陈词滥调的官方声明的余地。在今后几十年中,我们无法愚弄任何人,使他们接受我们不愿公开、全面坚决地走上造福之路的心态,尤其是在我们最贫困的人最需要这样的公开时。

这是各国间实现真正团结的价值。我们塞舌尔愿与所有国家一起结成空前的联盟,以引导人类的伟大之船驶向第三个千处之岸。

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驶向的是友善之岸。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塔尔外交部长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贝尔·萨尼酋长发言。

萨尼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向埃西先生和他的友好国家表达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他当选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的祝贺。我们相信,他的能力和技能将使他能够以最佳方式履行其职责。

我还愿向总务委员会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

此时,我不能不向埃西先生的前任、代表着友好的圭亚那共和国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在担任大会主席期间所进行的卓越领导和工作表示卡塔尔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赞赏。

我还高兴地向那些最近加入我们国际组织的国家表示我们的祝贺。我们期待着它们建设性和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以及捍卫其各项原则。

在此方面,我对南非共和国代表团和该国的伟大领导人、其第一位非洲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表示敬意;该国在其历史上的这一新篇章中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非洲大陆和国际社会的新成员。我们确信,该国的地位及其在各个领域

里的专长将使其有资格地发挥显著的作用。

我还愿重申卡塔尔国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充分信任和特别赞赏,赞赏他对本国际组织的承诺和奉献,以及他为维护联合国的崇高宗旨和推动其在国际上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作用以解决各种国际问题和危机所作的努力。这种作用将毫无疑问地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中发生充满活力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些充满活力的急剧变化尚未达到其顶点。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此时国际关系的新的格局正在不断地出现。这是一个所谓的新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阶段。

我们认为,这种新秩序的最为重要的支柱必须是对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的尊重,这尤其包括以下内容:主权平等原则、各国真诚地遵守其承诺的意愿、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各国对其资源的控制、不对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通过调解、对话或通过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各项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国际争端。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降临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目前正得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迫切的使用。联合国体系当前在面对过去曾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方面正处于各种国际努力的最前沿。这些问题现在也正得到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和组织的认真审议和辩论,以求找到解决它们的方案。

在此方面,卡塔尔国认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和组织是就关于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展问题和建立公正与均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开展辩论的最恰当的场所。

鉴于当今的各种挑战,毫无疑问,如果拟议中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要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话,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当成为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而不论其大小。因此,卡塔尔国支持重建该国际组织及其各机构的努力,以使其变得更加民主和充满活力,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满足新的国际要求、应付和平与发展的挑战、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任务。

这些问题是受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转变所左右的。首先,作为主要政治机构的大会、作为负责安全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与负责经济及社会发展问题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

间必须存在一种平衡的关系。

此外,大会及其各项决议作为一种审议和谈判以及就重要的国际问题通过决议的框架必须予以一种更加有效的作用。这与各国对主权平等原则和有效参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利所作出的承诺是完全一致的。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论其地位或实力如何,都不应在联合国之外垄断新国际秩序的形成,因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的真正代表。这样一个新秩序必须由各国集体地通过联合国加以建立;而联合国作为国际审议的唯一场所、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以及全面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环境和人权、以及与贩毒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机构的地位和有效性也必须得到加强和支持。

在此方面,我谨对秘书长在《和平纲领》报告中所陈述的观点表示支持,即国际大家庭当中的民主需要不论其大小的所有国家进行最充分的协商和对本组织工作的最充分的参与和介入。

我想提及同一份报告中所陈述的另一点,即预防性外交的使用要求事先对潜在争端的进行了解、参与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支持已经缔结的各种协议、以及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解决原先导致争端发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及其发挥《宪章》委托给它的作用所具有的能力方面的积极进展;这是由于其各成员之间所出现的新的合作精神使它能够对一些十分困难和敏感问题上采取集体措施并承担新的责任;这些新责任包括通过在过渡阶段对一些地区的管理并通过对选举和保护人权的监督扩大其在某些维持和平问题上的权威。然而,我们担心的是,安理会会成为一个习惯于把强者的意志强加于弱者的机构。

因此,我们认为,有些成员所行使的特殊权利和特权决不应导致为数有限的几个强国主宰世界事务发展进程。所以,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问题必须在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巨大增加的情况下加以处理,并同时与否决权的使用进行一些限制。

此外,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必须调动政治意愿来实施这些决议,并且在必要时强制实现和平,或者在存在诚意和各方愿意合作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我们认为,这才是保护新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它能够获得接受、被人们所信任并具有稳定性的万无一失的手段。

段。

我们希望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将标志一个新的更加强大和更加民主的机构的诞生。在此方面,我们对目前联合国内外关于重建本组织及其各机构所进行的讨论感到鼓舞。这些是十分具有建设性、认真和客观的讨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加着这些讨论。

卡塔尔国根据埃米尔哈利法·本·哈马德·萨尼酋长殿下和他的忠实继承人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酋长殿下的英明指教,一直通过一切方式参与解决与阿拉伯海湾和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支持海湾合作会议是因为它为海湾各国及其人民的利益服务。作为该区域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我们的安全与该地区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曾支持该地区的稳定并反对任何以武力实现该区域变化的企图。我们认为,该地区的安全要求在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在各国之间进行合作。我们认为,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应通过对话、调解或通过国际法院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从这一原则出发,卡塔尔国支持采取这些方法解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有关阿布·穆萨岛与两个迪布岛的当前的争端。卡塔尔国在阿拉伯范围内不断呼吁阿拉伯世界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斡旋,以促进阿拉伯团结,恢复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和文明进军中的作用。

我们极为忧虑的是在也门共和国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自争端开始以来,卡塔尔参与了外交努力以制止争端。尽管发生了流血和令人遗憾的斗争,友好的也门维持了其统一。众所周知,我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也门的合作合法性与统一,而且我们从需要维护也门领土与统一的信念出发,渴望根据这两项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至于伊拉克的局势,我们的立场是伊拉克的统一及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伊拉克必须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有关决议。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承认科威特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及其得到国际公认的边界。我们也同情伊拉克人民,考虑到他们的药品和食品极为缺乏,吁请减轻他们的困难。

关于中东和平,我们支持这一进程,并希望谈判将在各个轨道上特别是关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谈判将会取得具体进展。去年,我们欢迎巴勒斯坦-以色列协议,认为这是通向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正在欢迎此后采取的步骤,即管理权力的早日移交和自治范围的扩大,这都是朝着公正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迈出的重要步骤。我们也欢迎约旦-以色列关于结束两国之间战争状态和开始认真谈判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水和边界问题的声明。这一声明也是通向公正和全面解决阿以冲突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解决的基础是马德里方案、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以色列部队完全撤出一切被占领土(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耶路撒冷)、恢复巴勒斯坦人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家,因为耶路撒冷是和平的象征,是1967年以来被占领土的一部分。在过渡时期,不该改变这一领土的状况,特别是人口方面的状况。我希望在此重申必需制止以色列移民进程,这是非法的,是和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从这点出发,本届大会应该重申以前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宣布这些决议是不可更改的。

为了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我们参加了多边谈判。我们指出这些谈判不是取代双边谈判,而是对双边谈判的补充,并可能导致一无所获,除非在该地区实现公正与全面的和平。在这方面卡塔尔国于1994年5月2日至5日举办了中东裁军和区域安全工作组第五次会议,这一工作组是由多边谈判设立的。

卡塔尔的立场如下。首先支持一切国际努力来达成有关区域和国际裁军的一致意见,并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第二,在实现和平之后的军备控制安排应基于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与相互平等的承诺之上。第三,正如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有各方和此后的一切步骤所表明那样,国际一级,特别是俄罗斯联邦与美国之间军备控制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功。然而,那些努力并未在中东取得任何有形进展,因为有一个国家继续保留其核能力。第四,呼吁一切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同意遵守其保障措施并使其核设施接受国际检查。中东地区必须消灭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发射系统。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当以色列继续拒绝不扩散条约和遵守其保障制度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怎能决定恢复对以色列的技术援助。

我们十分关切地注视着兄弟国家索马里的局势。我们希望民族和解将保证索马里的统一、独立和稳定。我们希望在

此场合支持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作出的决定,建立阿拉伯部长委员会监测索马里的局势并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一起实现所期望的和解。

至于阿富汗,我们对继续发生的暴力表示忧虑并呼吁各派停止敌对行为,努力实现将优先考虑阿富汗人民利益的永久与和平的解决方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尚未目睹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在发生的悲剧。由于塞族侵略者实行了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暴行,穆斯林人民深受苦难,这些罪行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在欧洲犯下的一切罪行。尽管塞族拒绝了由五国起草并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受的国际和平计划,并未对塞族侵略者采取惩罚行为,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禁运却还在实行。国际社会至少应该使穆斯林能够行使自卫权,这是《联合国宪章》所含的一项合法权利。我们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成员国一起再次质问,为什么在对付塞族的时候会有这一切拖延?为什么允许他们继续占领通过武力获得的领土并在那里继续实现种族清洗的暴行?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坚决处理这一问题,不采用双重标准,并且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保证其经济状况能够使它生存下去。这肯定有助于在世界那一敏感地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卡塔尔国重申,它谴责这种侵略,并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及其同以萨拉热窝为唯一的不可分隔的首都的统一。

我们在欢迎美国国会通过得到美国政府同意的决议,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禁运的同时,却因安全理事会的最近的决议感到吃惊,因为该决议包括放宽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而正是这个国家支持塞族民兵继续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我们认为,这一决议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奖励侵略者和支持侵略的势力,是在侵略、屠杀和持续的种族罪行面前的退却。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不要奖励侵略。我们呼吁安理会通过宣布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为安全区,履行其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的责任。安理会必须保证不允许把任何军事援助运送给塞族人。必须通过取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禁运来使穆斯林能够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我们再次强调,必须把前南斯拉夫境

内的战争罪犯绳之以法,我们支持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提出的允许其参加五国接触小组的所有活动的要求。

世界经济正缓慢地摆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已经开始了一个有不同程度增长的新时期,在第三世界尤其如此,促成停滞局面的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债负担,由于基本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再加上生产领域中国投资的缺少和军备开支非常高昂,这种负担正在加剧。时至今日,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的工业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得能够制订一项明确的办法来解决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债务问题。

非洲的债务负担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它们影响了该大陆增长和发展的能力。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达成了许多重新安排还债日期的协定,还本付息的费用继续消耗所有出口收入的22%以上,并继续妨碍投资和人类发展。

在这方面,应该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开始南、北双方之间的对话,以便找到新的办法来实现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使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欠发达状况。我们认为,使世界摆脱贫困和欠发达状况是持久和平和全人类福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南、北双方之间对话的成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将促进建立一个新的更为现实和更为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南方的发展不仅符合南方各国及其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北方及其人民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国际贸易,将其作为所有国家实现繁荣的一个手段。我们因此欢迎最近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将导致使贸易自由化和在全世界出现不受限制的竞争。

人类当今所面临的,而且将在以后继续面临的威胁并不全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存在着环境恶化、贫困、欠发达、毒品、危及生命的疾病的蔓延、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等问题,这些问题每天都变得更为严重。这些非政治和非军事的问题在变得非常棘手和威胁到全人类之前必须得到紧迫的解决。

国际社会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感到关注的迹象之一,是举行了许多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过去两年中,在世界上举行了若干次这样的会议,包括维也纳的世界人权大会、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和明年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已经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通过决议和建议以及围绕这些决议和建议达成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在其处理的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果。

我们大家在这里所希望的是,不应把这些问题当作借口,来干涉别国内政,以歧视的方式与别国打交道,或在提供经济或发展援助时强加条件。

我在这方面提到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单独地或集体地征收碳税的主张。这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将损害石油生产国的经济,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经济。

卡塔尔国重申,它支持联合国进行努力来处理我所提到的问题。联合国是一个理想的机构,来从所有的政治、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方面处理国际和世界问题。联合国在《宪章》的激励下,能够通过建设一个以合作和相互信任关系为基础的世界,一个公正和稳定的世界来取得成功。

下午7时45分散会